

# 2009 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荣维木 高士华

## 一 中国方面的研究

### (一) 日本侵华研究

关于日本侵华,有两个方面的研究引人注目:一是宗教与日本侵华政策关系的研究;二是财阀与日本侵华政策关系的研究。先说第一个研究。王海燕的《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全面和深入地阐释了日本国家神道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产生的作用。作者认为:在日本历史发展进程中,神道曾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吸收外来文化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家神道却成为了近代天皇国家的统治工具,不仅起到控制日本国民的作用,而且还为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尤其是在侵华战争中,国家神道作为日本殖民地统治的手段还发挥了精神侵略的作用。作者叙述了日本在中国建立神社的过程,并深入分析了日本在中国广泛设立神社的战略意图:一是利用神道的“众神镇护”进行经济掠夺;二是以“肇国大精神”同化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三是强化在华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四是把神社作为占领中国领土的标识,具有很强的军事侵略性质。该研究给人的启示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是军事侵略,也是思想文化侵略。其实,日本利用宗教进行侵略,也包括了对国家神道以外宗教的利用。徐炳三的《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初探》(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详尽地探讨了日本是如何利用基督教会为侵略战争服务。作者认为:1931年-1945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基督教会积极鼓吹侵略扩张理论,为日本军事行动服务,协助日军控制沦陷区中国基督教会,从而配合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虽然日本基督教会政治态度的形成有很多客观原因,但其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因此它的战争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王柯的《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载《历史研究》第5期),则是探讨日本如何利用回教为侵华战争服务。作者指出:中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日本的战争决策机关即做出推进“回教工作”的决定。之后,日本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在穆斯林居住地区建立特务机构,拉拢回族军阀,成立受日本特务机关指挥的各种“回教”组织。这些工作无一不是为侵略战争服务。作者还认为,尽管日本的“回教工作”并未取得预期结果,但值得深思的是日本为什么会产生利用“回教工作”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念头,那就是企图利用宗教来分裂中国,以此削弱中国的抗日力量。

再说第二个研究。一般来说,战争的发生与经济利益相关,而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日本财阀的利益需要。坂本雅子的《日本财阀和帝国主义——以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为例》(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是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日本财阀与战争的关系。作者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本能和利益关系。在阐明三井财团直接参预侵华战争的过程后,作者说明文章的立意是:“笔者并非主张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这家公司特别地具

有侵略性,或该公司员工特别贪婪、残暴。而是要通过资本主义自身具有的法则性、本能性的本质指出,为什么最‘绅士’的企业活动却挑起经济侵略,寻求战争,最后成为战争犯罪的同谋。”该研究给人的启示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与日本财阀的利益密切相关。李宗远的《中日债务——析战前日本财阀对华经济侵略》(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是从中日债务关系方面来分析日本财阀与侵略战争的关系。他引用美国政府在日本战败后所说:所有日本财阀都是军国主义者,正是由于财阀的存在,才使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和征服成为可能。文章具体地分析了中日债务的产生、中日债务的性质、南京国民政府整理中日债务及措施及日本财阀对中日债务的强硬态度等。该研究的意义仍在于说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戴建兵、申玉山的《日本对华经济战中被忽视的一面——日本在华公债研究(1931-1945)》(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则是以沦陷区日本公债为研究对象,从一个方面说明日本的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分析了日本在华推行公债政策的目的是、日本公债政策演变的过程、日伪公债的种类及特点以及日本公债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之外,关于日军侵华罪行的研究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陈致远、朱清如的《历史档案记录的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该研究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以及苏联与日本披露的史料,并对应口碑史料,十分详尽地描述了1941年日军在常德地区播撒细菌致使当地疫情流行的过程,以及国民政府防疫部门对制止疫情蔓延所采取的措施。二是张生的《南京大屠杀受害者 PTSD 初步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作者提出:对于战争造成的“软性”、“隐性”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引起关注,现在国际学术界用正式定义的 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加以概括。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营造的极度恐怖环境,是受害者 PTSD 广泛产生的客观环境。受害者的 PTSD 症候表现为因惊恐而失去行为能力、精神失常陷于歇斯底里状态,记忆、情绪失控和自杀等。这种情况不仅较多地反映在直接受到日军残害的中国人身上,也反映到目睹暴行的旁观者身上,曾经救助过中国难民的美国人魏特琳最终自杀,就是典型的事例。该研究的价值在于,第一次运用了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还有一个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描述日本的侵华政策及其实施,却是研究发生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与战争相关的一段史实,这就是沈阳盟军战俘集中营的研究。这个研究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杨竞的《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考略》(载《历史研究》第1期),作者考证了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设立和运行的全部过程,认为:该集中营是日军“以战养战”战时策略的典型,以高死亡率、高度专业性和高官战俘在押为特征,突出反映了当时日军所设集中营的历史状况和特殊的历史目的。它是对日军践踏国际准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所犯战争罪行的见证。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作者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为人们全面了解太平洋战争提供了一个视角。另一篇是焦润明、王铁军的《日军“奉天俘虏收容所”的信函检查与对美情报收集》(载《历史研究》第5期),作者通过对吉林省档案馆所藏《第三次战俘通信检查报告》的分析,考证了日军试图通过对英美战俘的邮件和信函检查来获取美国的相关情报。文章披露,尽管战俘家属的信函均经过了美国审查,但日本仍然从这些信函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国内战争动员及宣传的情报、美国民众战争态度的情报、美国国内拥军及参战动向的情报、美国发行战时国债与大规模回收战略物资的情报、战争状态下美国国民经济生活的情报、美国部分科技与商业的情报、盟军战机型号与种类以及美军空袭作战方式的情报、美军俘虏敌军人数及对俘虏政策的情报等等。

## (二) 中国抗战研究

### 1. 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研究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的研究,有如下文章值得注意。首先是占善钦的《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权诉求的演变》(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以往的相关研究,多数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展开,少有研究中共建立独立政府的预筹。该文作者则提出: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力量、作用和影响等出现了明显有利于中共的变化,于是中共开始向国民党提出分配中央政府权力的要求。在联合政府主张之外,中共确曾对组建独立政府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虽然这种政权诉求与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不同的特点、影响和利弊,但都是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是相互配合、互相支持的关系。中共经过一番取舍,最终对两种诉求进行融合,使联合政府主张增添了具有指导性的组建独立政府的内容,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探索。该文的价值在于,合乎逻辑地描述了中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党派利益,以及这种利益对民族民主革命不同时期政策制定的影响。

其次是于化民的《《淮北抗日根据地纠正淮中、泗阳两案述评》》该文利用了邓子恢未刊文稿和其他多种史料,详实地叙述了淮北根据地的整风问题。作者提出:受延安的“抢救运动”的影响,1943年淮北根据地在运动中出现了两起重大冤案,即“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错判形势、混淆敌我”、“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采取逼供信”、“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等错误,致使千余人受冤。直到延安纠偏之后,淮北根据地才重新审查两案,拯救了受冤者。该文的价值在于,它披露了整风运动后期的“抢救运动”不仅在延安造成危害,还祸及到其他抗日根据地。

再次是欧阳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援用国民政府法律问题论析》(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作者明确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曾援用过国民政府法律。但对相关问题的判断总是不能简单化。从制定法的规定看,根据地援引国民政府法律的方式有多种,有的限于抽象的政策宣示,有的可操作性较强。各根据地之间则呈现区域差异;从纵向看,援用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减少,并且,这些援用的实效与根据地的司法环境相密切关系。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间、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

关于军事方面的研究,王建国的《新四军“发展华中”考辨》(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引人关注。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学界历来有所争论,而该研究是一家之言。作者认为:当时的“华中”是指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苏、皖、鄂、豫地区。新四军成立之初,毛泽东对苏浙皖交界特别是皖南的战略地位十分关注,而对“华中”重视不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并且成立了中原局,但由于战略判断失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就“发展华中”采取得力措施。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对“发展华中”影响有限。1939年11月以后,中共中央决心解决发展华中问题,但项英、陈毅分别主张重点发展皖南及江南,在抽调新四军主力部队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存在严重分歧,致使毛泽东一度打算以八路军作为发展华中的主力。直到1940年6月,为了解救江北被围困的新四军,陈毅才最终决定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最终得以贯彻。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作者比较客观而准确地描述了“发展华中”战略从制定到最终得到实施的详细过程。

关于国际关系与外交方面的研究,有以下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邓野的《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载《近代史研究》第6期)。关于1941年的日苏中立条约,学界的评价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一个过程,而此篇文章认为,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与国外形势的复杂性,仍然很难根据某一个方面的立场,做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结论。作者着重分析该条约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提出:该条约一方面对苏联有利,一方面又对日本有利,这种双重性反映在中国则是一方面对共产党有利,另一方面则是对国民党不利。基于这些原因,该条约当时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

议。中共全力支持,国民党强烈不满,而一般社会舆论则首先质疑苏联的对华政策,继而又质疑中共的民族性。作者还具体地分析了条约如何对中共有利,认为苏联的安全可保持它对中国发言地位,从而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者还进而以晋南战役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来说明日苏中立条约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作者结论认为:“政治是现实的,民族情绪可以对政治构成强烈的冲击与影响,但并不构成最终的决定因素。”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比较全面而客观地反映出日苏中立条约对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

二是王建朗的《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载《近代史研究》第3期)。该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充分利用了披露时间并不长久的蒋介石日记。作者认为:蒋介石日记所展示的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严重性大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蒋日记反映出,他对美国先欧后亚战略指导下的优先选择问题严重不满,并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担心日后中国将与其争夺亚洲领导权。对于开罗会议,日记反映出来的是蒋介石的态度远不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积极,导致中国对会议及会议中的会晤采取了低姿态。在史迪威事件中,蒋认为美国在军事上要以史迪威取而代之,政治上则以孙科取而代之。这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蒋处理史迪威事件的态度,甚至在蒋史冲突激烈的时候,蒋曾一度考虑辞职。该文的价值在于,它使人们比较真实地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另外一面,即冲突与矛盾的一面。

三是鹿锡俊的《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关系的转折》(载《近代史研究》第3期)。作者主要依据蒋介石档案、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速记录和日本外交文书等史料,论述了1935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的多重性问题。作者认为: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做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对事变的应对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了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难以接受的条件,最终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联苏政策,而对日则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主权、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该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特色是,研究对象不是双边而是多边,而只有通过多边研究,才能更深入地描述出三方互相牵制对史事发展产生的影响。

## 2. 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研究

关于经济研究,有如下文章值得关注。一是薛毅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工业近代化》(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早在几年前,就有人从现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抗日战争的历史,此篇仍是以现代化为研究视角。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完成工业革命,使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文章考察了在抗日战争特殊时代中国工业发展的概况,最后结论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有如下主要特征:一是建立起比较完整、独立性较强的工业体系,具有争取民族经济独立的重大意义;二是改变了近代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的局面;三是发展西部工业,改变了中国工业不平衡格局;四是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五是改变了地方经济分割的局面,形成了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六是在中国第一次建立起具有独立性的工业体系;七是重工业的比重增加;八是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九是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工矿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人员。该研究的新意在于,比较全面而客观地判断了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二是刘国武的《抗战时期的湖南工矿业》(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该研究也是以现代化为视角,具体地考察了湖南在战时工矿业的发展,结论认为,抗战时期湖南工矿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对抗战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奠定了湖南工业发展的基础,加快了湖南社会的演进。其表现特征,一是改变了战前湖南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和湖南原有的工业结构,形成了两大工业区;二是在经营上出现了一批省营或官商全营的企业公司,在企业管理上,工程师制渐渐取代了封建的工头制;三是

注重科技进步,实现了科研与生产的初步结合;四是加快了湖南社会的转型,不仅形成了新的工商业中心,现代化的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促成了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

三是林星的《抗战内迁与沿海省份内地城市的现代化——以福建为个案》(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该研究从战时内迁考察入手,具体地分析了内迁对内地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作者认为,不仅沿海向西南地区的内迁对中国现代产生了影响,沿海向本省的内迁也对现代影响。作者具体地考察了福建的本省战时内迁,结论认为,本省内迁促成了新中心城市的兴起;推动了内地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内地城市的文化教育水平;加快了内地城市的市政建设;改变了内地城市的城市体系。这种变化可以总结为:“抗战直接改变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格局,在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呈现出多化发展趋向……促进了原本落后地区的发展,城市现代也从此迈开了步伐。”

除了以现代化视角做研究外,还有如下研究具有新意。一是张晓辉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作者认为,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纷纷在此设立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对调剂金融,沟通外贸,购入军需物资,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弥补了战时经济研究的一个缺失。二是王晋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业》(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该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陕甘宁边区私营工业建立发展的过程、中共对其政策的制定、边区私营工业的性质、其内部的劳资关系等等。

关于社会研究,有如下文章引人关注。一是张志永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与婚外性关系》作者依据档案、报刊等多种资料,具体地考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一个方面,提出这样的观点:战时“华北农村妇女中普遍存在的婚外性关系现象,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一般农村妇女的婚外性关系群体,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叛离了‘三从四德’等传统道德规范,具有勇敢、能干等群体特点,易于参加中共革命运动,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初期发挥了先锋和带头作用。然而,婚外性关系毕竟是社会病态和革命对象之一,故在妇女运动普遍开展起来后,这个特殊妇女群体迅速分化,大部分成为革命者,其余则被革命淘汰。”这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也为人们观察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提供了一个新鲜视角。二是雷甲平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载《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作者较多地利用了陕西省档案馆档案、报刊及未刊资料,全面地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各类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婚姻及妇女问题、烟毒问题、匪患问题、二流子问题等。虽然这些问题已有一些文章专门述及,但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尚属首次,其意义也在于使人们对边区生存环境及中共改造环境做出的努力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 3. 文化思想方面的研究

关于文艺作品及其政治关联的研究,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孔刘辉的《天有病,人知否?——〈野百合花〉事件从解放区到国统区》(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关于《野百合花》事件及王实味冤案,以往有过很多研究,但这一事件对国统区产生了什么影响却少有人关注。此文恰恰是考察了这个问题,提出比较新的观点。作者认为,范文澜在延安批判《野百合花》被反共分子利用的时候,实际上国民党当时还未注意到这一事件,而正是范文澜的文章和延安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才引起了国民党有关当局注意,并利用这一事件来宣传延安的“黑暗”,最终王实味被处死的命运,中共想关机构及其领导人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国民党的大肆宣传客观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文的价值在于纠正了这一事件发生后延安的批判与事件最终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柴怡赞的《〈野玫瑰〉风波的再解读》(载《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该研究考察了抗战中期由话

剧作品《野玫瑰》引起的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纷争。作者认为这种纷争既有基于意识形态而对作品解读的不同,也有国共两党争夺话剧界控制权的斗争。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对文艺作品的评判,展示了即使是在全民族一致对外抗战的背景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也不仅是难免的,有时还会很激烈。

### (三)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虽然从数量上比前些年少了许多,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却把研究渐渐推向了深入。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篇文章。一是徐秀丽的《欧洲经验对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启示及其局限》(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作者认为,有过战争经历的国家进行共同历史研究、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以达成历史共识与和解,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重建,在欧洲有着较长的历史,而在亚洲,这种共同研究起步却比较晚,因此,许多欧洲的经验可以借鉴。文章分析了欧洲历史问题和东亚历史问题的相似性,认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亚,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都有着极强的关系,即解决历史问题有利于维护和平和稳定,符合相关国家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共同研究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可以借鉴的欧洲的经验,一是政府采取相对超然的立场;二是历史共识从直接参与的学者弥散到学术界,进而影响公众;三是列出最有争议的论点发展讨论,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四是呈现作为多面体的双方关系。同时,文章也分析了中日历史问题与欧洲历史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是中日战争结束时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未能解决的问题遗留较多;二是日本方面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不够彻底;三是从历史上看,“欧洲认同”强于“亚洲认同”;四是开始进行共同历史研究的时机与环境不同。而这些不同,又使得欧洲的经验在中日之间受到了局限。这些比较,对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中日政府间的和民间的共同历史研究有较大的参考意义。二是刘燕军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载《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该研究脱离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陈述,而是以文化现象的视角,对事件之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变化为研究对象。作者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京大屠杀被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象征而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但是,在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影响下,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又受到政治需要的影响,曾先后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使得记忆被误导变得扭曲。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出现,南京大屠杀事件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在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推动下,南京建立了纪念馆和纪念碑,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以向更深层次延伸。作者最后提出:“如何借鉴以往的经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该研究的价值在于,从一个方面阐释了历史与现实总是有着密不可分和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准确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则必须克服实用主义的影响。

## 二 日本方面的研究

2009年日本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从整个东亚的角度出发,摆脱一国历史的束缚,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依然处于人气上升之中。这不仅和东亚地理、历史和文化的连带关系有关,也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东亚的侵略扩张有关,更和日本的全球化、区域合作的深入讨论有关。

笼谷直人、胁村孝平主编的《帝国和亚洲网络》(帝国とアジア? ネットワーク),由世界思想社出版,该书把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历史时段,作为“长期的19世纪”来进行总体研究,把东亚和南亚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多角度特别是经济史的分析,饶有新意。

有志舍出版的由深谷克己主编的《东亚的政治文化与近代》(東アジアの政治文化と近代)一

书,也是试图从东亚的全体来探讨民族、国家、法律的变迁。其中山田贤的《“民族主义”的记忆和“秘密结社”》,讨论了中国近代史上民族意识的形成和秘密结社的关系,熊达云的《近代中日两国法律近代化过程的比较》,讨论了日本法律近代化的成功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角度新颖独特。

## (二) 对近代中日关系早期的历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到现在为止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多着眼于近代中后期的研究,对于早期的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近代外交关系的确立,不太关注。阎立的《清末中国的对日政策和日语认识》(清末中国の対日政策と日本語認識),由东方书店出版,该书探讨了1860—70年代的中日关系,从日语使用的角度,分析了《中日修好条规》的成立,以及驻日使馆官员在日语使用、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冈本隆司、川岛真主编的《中国近代外交的胎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以19世纪后半期为中心,分为“夷务”时代、“洋务”时代、“外务”时代三大部分,探讨了近代中国外交的演变。其中有两篇讨论了《中日修好条规》:森田吉彦的《日清关系的转换和中日修好条规》,探讨了中日近代外交关系建立的经过和《中日修好条规》的文本,五百旗头薰的《邻国日本的近代化》,讨论了《中日修好条规》在日本外交史上的地位,值得重视。

## (三) 1930年代到1945年的留学生史研究受到瞩目。

近年来日本的留学生史研究是以神奈川大学为中心展开的。大里浩秋、孙安石主编的《从留学生派遣看近代中日关系史》(留学生派遣からみた近代日中関係史),由御茶水书房出版,该书收集了有关日本人的中国留学论文3篇,中国人的日本留学论文6篇,除了探讨日本陆军和外务省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文、搜集情报之外,4位作者还分别对战争期间,“满洲国”(刘振生)、华北敌占区(川岛真)、内蒙古(祁建民)、汪伪政府(三好章)的留学生派遣,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分析,这些所谓的“留学”,当然都是在日本主导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培养亲日派,但不少人后来走向抗日前线 and 投入革命阵营,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也是留学生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

(四) 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日政治对立和军事冲突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认识问题,依然是热点中的热点。

松冈环主编的《战场之城 南京》(戦場の街 南京)由社会评论社出版,该书收集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证言,很值得参考。

《历史学研究》杂志,在第849号上推出了慰安妇研究特集,总结了慰安妇审判的经过及其意义,使我们对于慰安妇问题审判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斋藤道彦主编的《日中关系史的诸问题》(日中関係史の諸問題),由中央大学出版部出版,其中李廷江探讨了1880年代李鸿章对日本矿山技师的招聘,深町英夫总结了当时日本各方对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看法,吉见义明利用美国马里兰大学收藏的资料,探讨了1945年到1949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土田哲夫探讨了中国的对日宣战问题,鹿锡俊探讨了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技术人员的留用,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书中的斋藤道彦的《历史认识和现实认识》一文,总体回顾了历史认识问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值得参考,但因为没有具体展开,加上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倾向,脱离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常规,立论很难具有说服力。

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由刘杰、川岛真主编的《1945年的历史认识》,该书集中追溯1945年前后的历史,就战争结束时中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对应、留日学生的归国、日本人撤退问题、留用和残留日本人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的演变等,进行了日中学术对话的有益尝试。

有志舍出版了菊池一隆的《中国抗日军事史》(中国抗日軍事史),全面论述了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军事史,是第一部从中国角度论述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通史。

安富步、深尾叶子主编的《“满洲”的成立》(「満洲」の成立),由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重视生态学角度的考察,讨论了“满洲国”的社会、宗教、权力的变化及其与生态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伴随着一部分森林的消失所形成的东北近代空间,其中特别对由铁道、马车和大豆组成的新的“县城经济”,进行了详细分析,值得参考。

櫻井良树《辛亥革命和日本政治的变动》(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変動)由岩波书店出版,探讨了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并指出清末民初日本在介入中国内政的同时,对日本的内政外交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此以外,几本论文集也值得关注。

贵志俊彦、深町英夫、谷垣真理子编著的《近代日中关系的摸索》(摸索する近代日中関係),由東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从人的交流、知识的传播、外交交涉等各个角度,探讨了近代以来到1931年的中日关系,它是2007年11月3—4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清末中华民国初期的日中关系史——协调和对立的时代1840—1931年》的论文集。

金丸裕一主编的《近代中国和企业·文化·国家》(近代中国と企業・文化・国家),由人文书房出版,该书探讨了近代日本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上海以及在台湾的政治、经济活动和中日文化关系。该书是立命馆大学社会系统研究所丛书的第一种。

高纲博文的《“国际都市”上海中的日本人》(「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由研文出版社出版,探讨了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活动、上海的居留民社会、企业、租界,以及战败后日本人的撤退。

川岛真等人编著的《日台关系史》,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虽然讨论的是1945年到2008年的日台关系,但是其中对日本在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回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荣维木,本刊执行主编;高士华,日本东北文化学园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